

## 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与清末本土经典的“知识资源”转型

孙 青

### 一、 故事：商业竞争——清末知识转型期“规训”传统资源的一个实际场景

#### 1、沈知方、国学扶轮社与《文科大辞（词）典》

1915年商务印书馆隆重推出的《辞源》后来成了它的“看家工具书”。此书在高梦旦的一再建议下，由陆尔奎主持编纂，历时8年，经过两次大返工才最终得以完成。前后参加者近50人，使用资料10万多卷，耗资达13万元<sup>1</sup>。其盛誉自出版伊始至今不衰，语言学者称它为“中国第一本近代国语辞典”，“在现代汉语辞汇体系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sup>2</sup>。研究出版史的学者概括其开创性有三：盖“冶中西学识于一炉，接近生活；接受“词汇”的概念，以“词”而不仅以“字”为释义单位；按近代科学水平解释字词，有时代性”<sup>3</sup>。

相较而言，国学扶轮社前此4年编纂出版的《文科大辞（词）典》在中国近现代辞书史上的角色就显得颇为寒伧了。虽然人们注意到，《文科大辞（词）典》是最早以“辞（词）典”命名的辞书<sup>4</sup>，但对该词典本身却至多以其为“我国现代辞书的萌芽”<sup>5</sup>。汪家熔直斥其“粗制滥造”，说它“虽然在书名上有创新，但内容称不上一部近代辞书，而是一部用近代字典形式排列的古代类书而已。”<sup>6</sup>若从辞书史及现代汉语词汇史的角度来看，这样的评价并不算太有失公允。国学扶轮社同年推出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还曾热销过一阵，而《文科大辞（词）典》则似乎在当时就没能“站住”，以至于连被“翻印”的机会都没有，后世辞书史大多不载，纵有提及，也不过寥寥数语。如果不是因为它最早使用了“词典”这一名称，就几乎要在现代辞书史上销声匿迹了。

不过，如果暂离辞书史的论域，而立足中国现代知识转型的视角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宣统三

<sup>1</sup> 汪家熔：《《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辞书研究》，2001年04期。

<sup>2</sup> 沈国威：《《辞源》与现代汉语新词》，《或问》，大阪：近代东西言语文化接触研究会，第12号（2006年）。

<sup>3</sup> 汪家熔：《《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辞书研究》，2001年04期。

<sup>4</sup> 余家骥：《辞书说略——字书·韵书·义书》，《语言学刊》1994年第1期。

<sup>5</sup> 李宇明，庞洋：《关于辞书现代化的思考》，《语文研究》2006年第3期（总第100期）。

<sup>6</sup> 汪家熔：《《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载《辞书研究》，2001年04期。

年这部由国学扶轮社编纂出版的《文科大辞(词)典》，实际上是具有特殊意味的。

事情恐怕还得从《文科大辞典》的产生及其背后牵扯到的一段饶有趣味的商业公案说起。根据汪家熔、郑逸梅的回忆与考证，《文科大辞典》产生的缘由大致不脱这样一个轮廓：20世纪初，“书业奇才”、“营销高手”沈知方<sup>7</sup>在任职商务印书馆的期间，与王均卿刘师培等创办“国学扶轮社”，宋雪琴亦有投资，社址设在上海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平和里。至少在1905年以后，该社已出版编印有不少旧籍行世<sup>8</sup>。1908年商务开始编纂《辞源》，任职于商务的沈知方知道《辞源》的情况。估计其销路必旺，便请人抢先编纂一部以词汇为主的辞书，由自己的国学扶轮社推出，使占市场先机。根据汪家熔的判断，沈知方虽然知道商务在编《辞源》（当时还没有起这名），但对具体情况并不太清楚，所以并不能告诉编纂者《辞源》的具体要领。《文科大辞典》的编纂者“仅仅从辞藻的观念理解。因为要赶时间，也就毫不研究。将《骈字类编》略作取舍，变更词汇排列方法，名为《文科大辞典》（内封上题《文科大词典》“词典”一词是他首创。可惜因为这本词典并未流行，不为大家所知），在1911年冬抢先出版。因其粗糙，未能站住。”<sup>9</sup>文科大辞典有两个版本：一个以类书体例分40门排列词汇，一个以词汇首字笔画排列，内容相同。国学扶轮社同时出版黄摩西编的《普通百科大词典》。两部书同时还以“上海词典公司”名义出版。这两部书书名页均题“词典”，而封面题签均题“辞典”<sup>10</sup>。根据郑逸梅的说法，《文科大辞典》的发行方是“中国图书公司和记”，但汪家熔以为“1913年沈知方已经加入中华书局，商务、中华如同水火，而且沈知方

<sup>7</sup> 沈知方（1882-1939），原名芝芳，浙江绍兴人，祖上是藏书世家，不过至其父一代，已是家道衰落，仅有薄田数亩，靠摆书摊为生。沈年少时，就被父亲送到绍兴奎照楼书坊当学徒，1899年进上海广益书局，1900年入商务印书馆。学徒生涯，四处赶考卖书，让他熟悉了各地的书业行情，培养了浓厚的商业意识，积攒了丰富的市场经验。他在商务供职，虽未见重用，却深得老板夏瑞芳赏识，着意笼络。据说，沈在商务经常不按时上班，同事既有闲言，股东亦有碎语，夏瑞芳时为他袒护，说他“才气宏阔”，一旦让其离去，日后必将成为商务之患。夏的预言不幸而言中。1912年，商务的劲敌中华书局创办成立，翌年，沈知方就被中华挖了墙角，委之以中华书局副局长的重要职务。参见吴永贵：《沈知方，纵横书业的经营奇才》，载《光明日报》，2008年1月22日。

<sup>8</sup> “（国学扶轮社）1900年左右，设在棋盘街（今河南中路）平和里。是王均卿、沈知方、刘师培等创办的，宋雪琴亦有投资。国学扶轮社于1906—1907年间编印《古今说部丛书》（共60册，收266种）、《香艳丛书》（石印线装本，分20集，每集4册，共80册）、《清文汇》（共101册）、《明朝四十家小说》（共8册）等旧籍，由王均卿主持。又于1915年元旦创刊《小说海》月刊，32开本，由黄山民编辑。其印刷发行工作，系委托中国图书公司和记办理。沈知方这时在商务印书馆任发行工作，1901年脱离商务，与王均卿接盘乐群书局，加了泰记牌号。乐群编印教科书与商务竞争，但因侵害商务版权，被诉失败。1902年沈知方重新进入商务，直至1911年又与陆费逵脱离商务而办中华书局。在此之前，国学扶轮社与乐群书局两家，以10万元为商务所盘进。”，见朱联保：《近现代上海出版业印象记》，第277页。

<sup>9</sup> 汪家熔：《《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载《辞书研究》，2001年04期。

<sup>10</sup> 梁长洲（即汪家熔，梁长洲为其笔名。感谢邹振环教授赐教，纠正拙文草稿之误谬）：《郑逸梅〈国学扶轮社、秋星出版社的史料〉注》，见《旧文重刊》，《出版史料》，2004年第2期。

别名“书业奇才”，以善于发行见称，量不会托中国和记代售自己的书。”<sup>11</sup>

据汪家熔的说法，《文科大辞典》的编撰者与《普通百科新大辞典》实际上都是黄摩西。如果此说确实，黄摩西以一人之力所编的这两部分类词典，前者针对旧词，以帮助读解及写作典雅的传统书面语，后者针对新学科新名词，虽或确为抢生意的“急就章”，但背后却似乎不无仔细思量安排过的用意。《文科大辞典》以林纾为序，《普通百科新大辞典》请严复作序，当时世有“译才并世数严林”之说，沈知方的商业策划不可谓不动脑筋。

## 2. 《文科大辞(词)典》的“卖点”——编纂目的与特点

汪家熔认为，黄摩西之所以仍采用传统的词典编纂法，不脱《尔雅》以来“以义为纲”的类书模式，乃是因为沈知方不知道《辞源》的具体要领，因此无法传授机宜的缘故。不过，汪的判断似仅为猜测之语，即便事实真是如此，不管他们沿用传统的类书模式是不是经过仔细的比照与推敲，仅就“书业奇才”沈知方与“苏州奇人”黄摩西在不知《辞源》市场定位之就里时闭门造车，根据自己对于当时文化市场需求的判断设计卖点来看，两人能想出的“卖点”是什么，就已经十分有趣了。

根据《文科大辞(词)典》的凡例来看，清末这部最早出版的“词典”有四个明显的自我定位：

- (1) .《词典》(为了行文简洁，此处将《文科大辞(词)典》简称《词典》，下同)是为了在“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sup>12</sup>的新时代帮助人们写出“文从字顺、典瞻风华”、“单词片语皆有来历”的典雅文章，并“兼备教授国文者参考之用”的<sup>13</sup>。
- (2) .《词典》针对书面语，以备“修词之用”，体裁上是以传统类书为基础的，沿用了自《尔雅》以来至《骈字类编》以意分类的模式。应邀作序的林琴南也把这部词典与古来的各种类书作比。
- (3) .《词典》希望区别于传统类书型词典的做法主要是：采用与“欧西之辞典同体”的编纂模式，按部首笔画排序，并“举单字为之发凡”、“齐首一字骈联而下，凡从某字者均从某字类推”，即按首字组词的方式来编排。强调首字的指意功能，通过解释首字来帮助理解选词；区分出“体用词”及注明具体词性；<sup>14</sup>每个词条下不仅列举其出处用例，也作简单的定义解释。

<sup>11</sup> 同上

<sup>12</sup> 林纾：《文科大辞典》序，(清)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修词学之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

<sup>13</sup> 《文科大辞典》凡例，(清)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修词学之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

<sup>14</sup> “一吾国旧有之类书，大都摘录事实，其体用词绝少。本书所以佐各类书之所不及”，《文科大辞典》凡例，(清)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典——修词学之部》，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74年，影印本。

(4) .《词典》虽欲有别于类书，但却觉得传统的按意义分类的方法仍有实际应用价值，因此“本书虽别于各类书，然为便于应用计，故特分四十类”，只是并不按类目索引，不再“以意为纲”在“每条所注名代动静状叹等字下附列类名，并依日本索引表法另列一目，注明某类在某划某字第几以便检查”。也就是说，意义类别在这里已经成了辅助检索项，供人在写到或者读到某一方面的文章时参考所用。这一点与传统的百科类词典有了明显的区别，而开始接近现代语词词典的规范。

### 3、商业竞争：清末知识转型期“规训”传统资源的一个实际场景

国学扶轮社《文科大辞(词)典》的上述定位多少体现了沈知方及黄摩西等在清末知识急剧分化之际对文化市场需求的判断。沈知方当然是同样感受到清末十年间新词新语大量泛滥，科举从内容改变到完全废止又使文人学士作文修辞的场域发生了巨大变化等情况，才会据此判断商务投入巨大人力物力筹备的《辞源》会有极好的市场反应，进而起了捷足先登“抢生意”，分润其市场的念头。与《辞源》后来“重诠释”、“以补助知识为职志”、“供一般社会之用，非徒为文人学士之用。故其性质适与类书相反”<sup>15</sup>的鲜明定位相比，国学扶轮社并没有彻底抛弃传统类书型辞典的分类模式，也没有想在一套辞书里面同时解决新词与旧语，而是同时策划推出了两套词典。《文科大词典》针对传统书面语中的旧词，“过僻与不典雅者及一切新名词概不阑入”，以解决写作典雅文字与阅读经典的问题；《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针对新词，“收辑一切学语，调查种种专门学书籍为基础，中外兼收，百科并蓄，以适用于教员考检，学子自修为宗旨”，其广录博取至今仍为学界称道。

如果实际情况恰如汪家熔所推断的那样，沈知方是没有摸到《辞源》的底，仅仅“偷窃”了它的立意，从而策划了《文科大词典》与《普通百科新大词典》。那么，这位市场嗅觉敏锐，尤以发行见长的“书业奇才”他当时的独立判断应该是认为，即使处于知识急剧变化的时代，写作典雅的书面语与使用新学语是同样有市场需求的。

我们或者很难判断《文科大词典》及《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没有完全按照“欧西字典编纂法”彻底放弃中国传统词典“以意分类”的做法，究竟是限于策划者的眼光因而“棋差一着”，还是根据他们对市场的独立判断有意为之（实际上，根据林纾在序言中已经提及“欧西词典编纂法”，以及黄摩西编撰《普通百科新大词典》时所表现出来的广博视野，并考虑到沈知方在商务身处关键岗位等情况，综合这些因素来揣测，要说沈知方和黄摩西对“以形为纲”的语词词典完全没有闻，倒是颇难置信的）。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沈知方、黄摩西们至少认为他们这套词典相较于传统的《骈字类编》等类书型词典而言，更能适应时代的需求，因而具有市场竞争力。

前文已经述及，《文科大词典》自认为对于传统类书型词典的最大改进主要集中在两点上：1、为从传统经史子集类典籍中选出的词条区分词性。2、为选出的词进行新的分类。

<sup>15</sup> 陆尔奎：《辞源说略》，《东方杂志》1915年12卷4期

虽然说“以义为纲”是中国传统的词典编纂法，自《尔雅》至《骈字类编》一以贯之，这与中国古代词书属于小学范畴，服务于“释经”目的有密切的关系，但是《文科大词典》为选词分类的出发点却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根据《文科大词典》的凡例与序言来看，其市场定位是辅助读书人在“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的时代写出典雅的文章，兼备教授国文之用。我们知道，宣统三年科举已废，文化市场上人们遣词作文的场域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读解传统经典的语境也已经脱离了单纯的“释经”而转到了“教授国文”的架构之下。为《文科大词典》作序的林琴南当时是在“承乏大学文科讲席”并“兢兢然日取《左》、《国》、《庄》、《骚》、《史》、《汉》八家之文，条分缕析，与同学言之。”而“国学扶轮社”以扶轮“国学”为宗旨，这部词典本身更是以“文科”为名，这些都不是纯粹的巧合。只因晚清几十年间的知识转型，到了科举废、学堂兴的清末已经产生了结构性的结果。

《文科大词典》在“文科”、“国文”这类现代学科架构下考虑自己的市场取向，希望帮助人们在“新学既昌”知识急剧分化的新时代写出典雅的文章，它为选词分类的方式就决不能仅仅停留于《骈字类编》时代的13类上了。因为传统的经典虽然没变，这些词汇本身也与清初没什么两样，但是应用它们以遣词行文的内容、场合与语境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写典雅的文章再也不是为了应付科举或者解释经学，人们运用这些典雅的词汇更多的是在新的“国学”、“文科”的视野下，作文的内容也许会涉及“动物”、“植物”、“商业”、“工业”、“农业”、“矿物”、“政治”这样一些全新的话题。因而《文科大词典》虽仍采用传统的类书型词书的分类模式，其立意取向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正如汪家熔所说，《文科大词典》选定的首字有80%是来自《骈字类编》，“按首字所属部首、笔画排列，再在词藻中挑选约20%成为词条”，此外也有一小部分来自《佩文韵府》<sup>16</sup>。因此可以肯定，这些被选的“词汇”实际上是传统的，与《骈字类编》、《佩文韵府》的时代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文科大词典》对全部词加注了词性、词类；对一部分词加以解释。引文基本上采《骈字类编》的同词条下的第一项，而舍弃其它，这就是《文科大辞典》所谓“删其枝蔓”。它将类目从《骈字类编》的13类扩充到自己的40类，添设了许多新的知识门类；并对选词的传统语境做了删除“枝蔓”的简洁化，以便使人“开卷瞭然”。这些工作便是沈知方们设计的“卖点”。实际上若从“知识规训”的角度来看，《文科大词典》出于商业考虑已经根据当时文化市场的需求不自觉地重新定位、解释、裁剪了传统。

我们知道，在中西学问遇合之初，以西学来比附传统的情形就出现了。而这种情况一旦进入晚清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动因也就更为错综复杂。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比附中西，是为了在本土学术体系下暗渡陈仓，以实现宣传教义的目的。中国自身则有更为精致的“西学中源说”。在本土学术势强阶段，它为政见截然相左的洋务派与保守派同时提供了理论支持，倡导或反对西学的理由尽都建基于此。戊戌前夕，西学之势转强，学界各色人等都参与到对传统资源的重新解

<sup>16</sup> 汪家熔：《《辞源》、《辞海》的开创性》，载《辞书研究》，2001年04期

释中来。其中有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有“言西学之第一人”的严复；有欲与西方列强“竞学”的《新世界学报》同人；更有“国粹派”知识分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一时间，按照西学来比附解释本土传统似乎成了晚清知识分子共同的“魔咒”，竟无人能免俗。

与上述种种情况相比，清末宣统三年出现的《文科大词典》，其重新“规训”传统的做法既没有“西学中源说”的主观故意，更远远没有达到“整理国故”的高度。它只是一个商业运作的产物，不可能如康梁一般有争夺论证现行政治制度合法性资源的政治关怀，也不会像严复那样因为了解西学而按照正统的西方学术眼光来重新打量中国本土知识。然而，这样一个商业运作的产物却恰恰体现了新型知识分子对于当时文化市场的判断，它根据市场的实际需求重新梳理着中国的传统典籍中的词汇、因而不自觉地重新定位了传统典籍，用当时最实用的分类法按照“时代的需求”重新规范与定义着“传统”。实际上，清末出版市场上这次几乎被辞书史遗忘了的商业运作已经构成了清末西学影响本土知识再生产的一个重要场景。如果说中国现代学术是西学东渐背景下知识“就地再生产”的产物，那么，清末辞书出版史上的这次不成功的商业运作，便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实际生产场景。下文便试着以《文科大词典》的“政治类”词条为例，来检讨一下它重新规训“本土经典”的具体情形，及其对“政治学”本土知识谱系建立的影响。

## 二、 图景：《文科大词典》对“政治类”知识之本土经典谱系的界定

### 1、《文科大词典》中的“政治类”选词及其摘录的“语境”

《尔雅》作为“我国古代词典之先河”首创了“按内容性质分类释词的体例”。<sup>17</sup>到成书于雍正四年（1726年）的《骈字类编》，“以义为纲”、“按类编次”、“以类（门）统字”已经成了中国传统词典编纂的主流模式。林纾追溯《文科大词典》的编纂体例到《骈字类编》是有道理的。《骈字类编》以首字为目，将其按字意编入具体的门类。然后从首字骈连而下，编选同一字头的二字词，罗列它们在经典中的出处与用例。而对首字本身，除了将其归入一定的门类以外，并不作解释。《骈字类编》分13个门类选词，具体为：

天地门、时令门、山水门、居处门、珍宝门、数目门、方隅门、采色门、器物门、草木门、  
鸟兽门、鱼虫门、人事门

而《文科大词典》则扩充到40个门类：

宗教类、植物类、职官类、政治类、珍宝类、灾变类、杂技类、语言类、舆地类、饮食类、

<sup>17</sup> 刘叶秋：《中国字典史略》，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9页。

音乐类、艺文类、仪容类、性情类、刑法类、武备类、文学类、天文类、岁时类、氏族类、神怪类、身体类、商业类、人事类、人伦类、器具类、品行类、农业类、礼制类、矿物类、居住类、闺阁类、工业类、服饰类、风俗类、方术类、动物类、帝王类、道学类、称谓类

两书的类目名称除了“人事门”、“珍宝门”以外多不重合。但是仍可以看出类目前后延续的痕迹,如“草木门”变成“植物类”,“鸟兽门”“鱼虫门”变成“动物类”等。这其中,“政治类、”是完全新增的,与“政治类”相关的实际上还有“职官类”、“帝王类”等。

《文科大词典》的“政治类”下共收词264个,多为二字词,略有三字词如“五裤谣”、“殿脚女”、“四桁税”及四字词“五花判事”、“参知政事”。这264个词分别为:

七教、九功、九正、九合、九式、九法、九牧、九经、九职、九赋、二政、八政、八科、几顿、力术、力役、土功、士乡、子来、门摊、马政、与国、五花判事、五典、五教、五裤谣、井税、什一、仁风、仁闻、元元、六计、六典、六联、内事、内政、冗费、分强、化育、太平、夫布、户口、户税、文约、月吉、木铎、世事、丘甲、令甲、半丁、半租、去几、召集、号令、四门、四桁税、外朝、头会、左道、巨获、市令、市政、布告、布冒、布濯、平世、平平、平国、平康、平章、本作、正法、正直、民力、民生、田功、田役、田制、田赋、白著、节奏、仰议、任使、众建、全丁、全治、名数、在宥、地守、地贡、地政、地职、多昏、孙谋、安集、尧章、岁会、巡功、巡问、巡狩、巡靖、约从、轨量、驰力、严更、利器、园户、园尘、声教、戒书、更钱、机陞、材贡、汪濊、沈沈、牢笼、纲纪、财成、财贿、财赋、陆危、侧席、典刑、典要、参知政事、图书、图籍、备问、备置、姑息、委府、委积、庞洪、弥缝、征令、征缮、拔去、拔正、河防、画一、绎思、绎思、经入、经费、经略、经营、苛政、苛愿、苛愿、诗商、货贡、前功、复逆、宫市、封侯、总布、恢复、故国、荐贡、残害、浑浑、科第、茶政、茶禁、贰令、信贷、党锢、宽然、宾服、牺赋、盐法、盐赋、称贷、继望、羞服、致吐、贼虐、逋租、酒禁、酒榷、铁券、铍滑、陵夷、陵迟、颂共、悖史、惨酷、敛法、敛然、梦梦、检式、淫愿、淳化、淳耀、章程、综核、绿章、萧然、野禁、阐大、阐并、鸿均、凿空、媮恃、恭间、愉铤、景员、洒洒、焜耀、登闳、登降、登庸、编列、谤木、贯赦、赋予、赋纳、赋贡、赋贷、赏赐、遂行、遍行、遐武、雁户、嫔贡、殿脚女、溥大、滔德、甄陶、筹略、简稽、粲然、置传、腥臊、裨辅、解送、註乱、註误、输平、辟书、辟回、辟法、管节、纓纓、德法、播弃、敷施、暴虐、暴察、横政、翦弃、颛制、黎求、器贡、圉法、赞赞、辨章、繇费、警丑、麒麟、鞠钱、壤奠、縞头、纂修

仅从词语本身来看,有一些是清末早已退出现实政治生活的历史陈迹如“宫市”、“殿脚女”(实际上,这类名词在历史上也只是出现于特定的时空,属于昙花一现偶然性的名词)。虽然文科大词典的编纂目的是为了帮助文人写出“单词片语皆有来历”的典雅文章,或者帮助读懂因用典繁复

而难以索解的文章，但是仍很难想象像“宫市”、“殿脚女”这样的词汇会出现在讨论现实政治问题的语境下。那么《文科大词典》分类的依据是不是词义本身呢？实际上，我们发现选词中有很多是描写抽象感觉的“状词”，如“平平”、“萧然”、“沉沉”、“粲然”、“漫漫”等，如果脱离了语境来看，则很难将其与现实政治问题联系到一起（虽然，《文科大词典》是在清末以来的传统意义上使用“政治类”这个概念的<sup>18</sup>，与西方政治学概念并不怎么相干）。

那么，且让我们以“粲然”一词为例，来分析一下《文科大词典》的词汇分类原则：

选词	词性	类别	释义	出典	引文
粲然	状	政治类	明白之貌	《荀子·成相篇》	欲观圣王之迹，则于其粲然者矣
粲然	状	饮食类	精洁貌	《荣辱篇》	俄而粲然，有秉白藜稻粱而至者
粲然	状	仪容类	盛笑貌	《谷梁传·昭四年》	军人粲然皆笑，又明貌
粲然	状	仪容类	盛笑貌	《前汉·董仲舒传》	粲然有文以相接
粲然	状	天文类	明貌	《儿宽传》	天文粲然
粲然	状	文学类	无	《后汉班固传》	大义粲然著矣

我们发现“状词”“粲然”一共被归到了政治类、饮食类、仪容类、天文类、文学类等5个门类之下。其所以被划归不同的门类，并不是因为它的释意有“明白之貌”、“精洁貌”“盛笑貌”“明貌”之区别，而是在于它修饰的主语及出典。之所以被归入政治类下，是因为它描写了“圣王之迹”。因此《文科大词典》为选词分类的原则是原词在经典中的具体语境（或曰出典引文），这一点是很了然了。

实际上，中国传统书面语追求所谓“典雅”，强调语有出典，实际上是希望把语词的原始语境尽量多地保留下来，与语词本身打包在一起，通过“用典”的方式把整个语境传递下去。因此，传统词典并不对词义本身下简单明确的判断性概念，而是给出尽可能丰富全面的用例语境。这种感觉性而非概念性的语文观与强调主观体验所谓“写意”的中国文化精神是高度一致的。而到了宣统三年，《文科大词典》出版的时代，中国传统知识世界已经因为与西学近百年的遇合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具体到语词史上而言，除了新语迭出以外，定义独立明确的概念型释词方式开始以席卷之势取代了传统的感觉型释词方式，这一点也是中国现代语言兴起的重要背景之一。

《文科大词典》的出版定位是为了帮助文人学士在“新学既昌，旧学日就淹没”的时代仍能

<sup>18</sup> 关于“政治类”知识的内容演变，本人在学位论文《晚清之“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的前史研究》有详细讨论。参见孙青：《晚清之“西政东渐”与本土回应——中国现代“政治学”建立的前史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将出。



写出“单词片语皆有来历”的典雅文章，或读懂用典繁复的文章。也就是说它仍然希望以传统的方式将词汇的原始出典与词义打包在一起传递。但矛盾的是，它又强烈感受到这样的方式已经不怎么合乎时宜了。不然凡例不会说“本书诠释详明，引证确当，遇有僻字并释其音。唯不尚繁称博引，以绝支蔓之弊，使开卷瞭然”，追求释词“明确”了。

《文科大词典》在知识高度分化的新时代试图将传统经典中的具体“语境”定格到新的门类中去（如前文所述，《文科大词典》将语词分类的做法与《骈字类编》有了本质的区别，因为这种分类是以教授“国文”为目标，为协助释义而加的，因而已经违背了传统“以义为纲”的初衷），同时又感受到市场的呼唤，而欲“删其枝蔓”，这种矛盾的立场势必导致重新剪裁传统，进而按照时代的需求重新“规训”传统知识资源，这一点基本上大致无疑。

那么，就“政治类”的选词而言，这种对于传统经典的重新定位究竟造就了怎样一幅图景呢？根据本文附录所列，我们可以发现，《文科大词典》在“政治类”下收录的267个词，其出典最集中的典籍是《周礼》、《礼记》、《尚书》、《史记》、《汉书》、《左传》、《管子》等，具体的语境基本上是出于讨论传统典章赋税制度以及王者之事的场景之下。那么这样的图景对于中国现代知识转型而言又有怎样的意味呢？实际上这已经涉及了中国现代政治学知识兴起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即学科本土谱系的建构问题了。

## 2、“政治学”的中国本土谱系

早在1898年科举改重策论时，这一措施便刺激了广大读书人从传统中去梳理“政治典籍”。在1903的《中外策问大观》中，此类策问便屡见不鲜，如：

东西政艺之书，新旧译卷累千百，然其中有立说偏宕不合中国之情势者，有新说盛行旧说已成筌者，议论歧出折衷匪易。试为掇其英华，略其芜杂，分别部居论定大旨，为学人导其门径策<sup>19</sup>。

又如：

问中国政治上下古今载籍极博，今科举改章当以何书为宗得瞻经济，试筹议之。

彭世襄在其屡被选作范文的答卷中，清晰地勾勒了本土的“政学”典籍谱系：

……《易》、《诗》、《书》、《礼》、《乐》、《春秋》无一非教学之书。既无一非政治之书。不独《书》之典谟训诰，足以道政事也。随借汉儒撰述，依托圣言，而实可为古者学政不分之证。

<sup>19</sup> 雷绍：《中外策问大观·学术卷二》，砚耕山庄，清光绪29年（1903）

宋赵普亦谓“以半部论语定天下”。而《周礼》者，则尤体国经野之专政书也。……史学为后世经济所从出则以《御批通鉴辑览》为宗，而辅之以九通。近上海图书集成局，集股开印，取值颇廉，虽尚未成书，约一年可竣，此两书为政治之大观，即为经济学之根本。由是而读顾亭林《郡国利病书》，所以知风土也。由是而研求《大清律例》及《刑案汇览》两书，所以明律令也。由是而通考各国条约，购天津所刻《约章类纂》而究之，所以识外交也。取类不繁，而学四五年，其措诸行事，必有以异乎向者之迂疏矣。若夫爱博不专，而卒至于一无所用，或舍我中国所自有，而专以变革为宗旨，则非愚之所敢知者矣<sup>20</sup>（句读及黑体字为笔者所加）

此时，人们按“西方政治之学”重新塑造传统的结果是：《春秋》被定位成等同于西方公法、公理学的东西，《周礼》也被明确为一部政治学经典。

对于传统政学类知识向现代“政治学”转型的过程而言，如何重新定位本土经典，实际上已经牵涉了学科的“普适化”问题。“政治学”这门在西方世界日趋体系化的社会学科，只有在中国本土传统中也能找到深厚的理论基础、人物渊源及经典体系以后，才能在本土获得“普遍性”的解释力。

而“西方政治之学”与中国本土传统的互动，始终是“政治学”本土学科谱系形成的重要背景。它发生于晚清学术转型的历史背景之下，其动因也就十分错综复杂。早期基督教传教士比附中西，是为了在本土学术体系下暗渡陈仓，以实现宣传教义的目的。中国自身更为精致的理论“西学中源说”，强调“西学、西政”全然发源于中土。由于中国自身传统中道断绝，“畴人弟子抱器西去”，方于西方“肃杀阴惨”之地发展成今日的西方政学。在本土学术势强阶段，“西学中源说”为政见截然相左的洋务派与保守派同时提供了理论支持。可以说，“西学中源说”就理论而言，比之新教传教士要远为精致。并且在这最初的两个阶段中，人们的主观目的各不相同。新教传教士比附中西学问，是为了令他们的教义更易为人所理解与接受。而中国士人则要证明所有的西学及政治理论全部是出自中国传统的，倡导或反对之的理由也都建基于此。但是，这两个阶段仍然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共通之处：首先，人们都在本土学问模式内进行着比附，基本上没有触及传统的知识分类法。其次，大家都不约而同地从原先处于边缘地位的“子学”中寻找一些资源。虽然这个阶段，大家的出发点都尚不在于以西方政治学的学理去重新诠释及规范中国传统，但是就日后中国政治学传统系谱的建立而言，一些最基本的东西无疑是在此时奠立的。戊戌前夕，西方社会学科及其相关理论其势转强，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派，严格按照西方“政治学”理论及叙事模式重新梳理和解释传统。康梁维新派除了欲依此打造适合本土传播的“政治学”新学科外，其旨在继续控制经“政治学”改造后的传统，掌握论证现行制度合法性的资源，其意图也颇为明显。严复虽然否认中国传统中存在西方式“即物穷理”的“政治学”，但是仍然在本土资源中寻找与斯

<sup>20</sup> 同上。

宾塞“社会进化论”相对应的内容，他甚至首次将中国传统分封意义上的封建论，与西方封建时代等同起来，并把宗法社会看作封建时代的产物<sup>21</sup>。《新世界学报》在传统中溯“政治思想”之源，乃激于与西方列强“竞学”的外部压力，欲建立具有“世界学”资格的本土政治学。与《新世界学报》同人颇有学术渊源的“国粹派”知识分子，则出于本土学术求新求变的内部需求，以“西方政治之学”为治诸子或《周礼》义理学的新手段。这其中传统诸子学与外来的西学也存在着类似的互动关系：一方面自基督教传教士到国粹派，不约而同都从先秦诸子资源中求取与西学对应的内容。另一方面，诸子学在晚清学术转型中渐渐走至研究前台，便也从西学西政的理论及叙事方式中，寻求着突破自身所谓“义理”研究的新方式。

出于这些形形色色的复杂动因，西方政治之学与中国本土尚处于发展变化中的学术传统，不断地发生着互动。到二十世纪初年，西方日趋制度化的社会学科“政治学”就在上述互动中建立了自己的本土学术谱系。西方日趋制度化结构化的“政治学”作为一种外来“学理”，也因此最终完成了在中国的“本土化”与“普遍化”。到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政治思想史”已经成为叙述中国古代思想的通行模式之一。当时至少流行着六种以上的同名著作<sup>22</sup>，其中陶希圣及萧公权所著的便是两种大学通用教材。“中国政治思想史”成了最高学府政治系的必修科目之一，沿用至今。

### 结论：国学扶輪社《文科大辞典》与清末本土经典的“知识资源”转型

“西方政治之学”以“正法眼藏”的名义重新叙述及解释传统的方式实际上层次极为丰富。其中除了立志与西方“竞学”的知识分子如《新世界学报》同人等，积极努力依据本土传统塑造着他们心目中具有“世界学”地位的“政治学”形象以外。像《文科大词典》的策划者沈知方这样，出于对文化市场需求的敏锐嗅觉，捕捉商机，在编订词典、教科书之类时不自觉地按照当时流行的知识视野来重新梳理传统经典，也构成了本土经典向新“知识资源”转型的重要合力之一。具体到政治类知识来讲，它客观上参与了政治学本土谱系的塑造。这门在西方世界日趋体系化的社会学科，因而在中国本土传统中也有了历史悠久的经典体系，这对于“政治学”在本土获得“普遍性”的解释力而言，客观上是极为重要的。

<sup>21</sup> 参见赵利栋：《近代中国的封建与封建主义》，见《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02期。

<sup>22</sup> 如陶希圣：《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新生命书局1932.5-1936.5；重庆：南京印书馆1942.10-1944；上海：中华印刷出版公司1948.9-10；陈安仁：《中国政治思想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2.12第一版，1934.4第三版；杨幼炯：《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丛书第2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5月初版，1937年7月再版；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店1937年6月版，上海：生活书店1947年再版，上海：东北书店1947年11月；萧公权：《中国政治思想史》（部定大学用书），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4，上海：国立编译馆1945.12-1947.6；秦尚志：《中国政治思想史讲话》，世界书局1945.11。

至此，我们被清末文化市场一个饶有趣味的“抢生意”的故事所引领，进而窥见了中国现代知识转型期，“日昌”之“新学”重新“规训”旧传统旧经典，将其转变为新的“知识资源”的一个具体场景。我们发现，有意思的是，参与这场传统转换，在新知识就地生产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的一些重要力量，竟未必有什么强烈的政治目标，文化诉求，有时候甚至连明确的主观故意都未必有。而中国现代知识的兴起，恰恰是在这种错综复杂层次丰富的历史背景下一步一步展开来的。